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时代探析

沙武田 李晓凤

(陕西师范大学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9至10世纪, 随着藏、汉两种文字《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的译出, 六字真言开始广泛流传, 并对崇尚佛教的宋、辽、西夏产生深远的影响。元代统治者尤为推崇藏传佛教, 六字真言则以多种文字形式广为传播。研究表明, 敦煌石窟所有六字真言题识不大可能像传统的观点认为始于元代, 而应是产生于西夏而流行于元代。就具体的时代作品而言, 西夏主要包括莫高窟第464窟后室东壁门上方和第95窟六字真言团花中的文字; 元代则包括莫高窟北区诸石窟中的题识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明确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产生的时代, 对研究敦煌西夏元洞窟的分期断代、壁画内容、艺术风格、洞窟思想以及社会背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敦煌石窟 六字真言 西夏 元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9) 04-0082-18

六字真言, 又称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陀罗尼等, 读作 om ma-ni pa-dme hūm, 汉语写作“唵嘛呢叭咪吽”, 本意为“祈愿宝珠在莲花上”, 是佛教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 不仅深受藏传佛教的尊崇, 也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核心。张保胜首先对六字真言曼陀罗书写形式和佛教内涵做了考释^①。今枝由郎以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六字真言为研究对象, 进一步考证了其经典来源以及梵、藏、汉各个版本的产生时间与流传情况^②。阎文儒、李永宁、敖特根等对元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以下简称《六字真言碣》)的碑文、立碑者、立碑时代、宗教性质及参与此次活动的人员情况作了充分的研究^③。

收稿日期: 2019-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16ZDA116);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多民族文化视域下的西夏凉州历史构建”(2018TS047)

作者简介: 沙武田(1973-), 男, 甘肃会宁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李晓凤(1992-), 女, 甘肃武威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

① 张保胜《两副曼陀罗的考释》,《南亚研究》1983年第2期,第77-82页。

② [日]今枝由郎《敦煌藏文写本六字真言简析》,王尧编《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65页。

③ 阎文儒《元代速来蛮刻石释文》,《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34-42页;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3年,第108-112页;敖特根《〈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第77-81页。

张铁山、彭金章通过发掘和整理敦煌北区石窟，对莫高窟第 464 窟回鹘文经文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其中包括该窟中所有的六字真言题记^①。杨富学对河南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的内容、佛教功能以及流传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认为“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②，他进一步指出，敦煌石窟所见六字真言“都与元末嗣王家族在 464、465 窟为中心的北区的活动息息相关”^③。此外，他还将第 464 窟中所见六字真言题识作为重要的断代依据之一，认定“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④。近期，又提出“学术界所谓的‘西夏窟’，除榆林窟第 29 窟外，其余大多应为元窟”^⑤的观点。因此，明确六字真言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是我们进一步确定敦煌西夏元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线索。那么，把敦煌石窟所有六字真言创作的时间都确定在元代这一说法真的确信无疑吗？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事实上，在辽代佛塔、辽代墓葬、黑水城出土西夏刻本佛经以及武威西夏墓葬中，发现了为数不少并具有明确纪年的六字真言，这不得不使我们对六字真言产生与流传的时间产生疑问，是否真的是“始于元朝”呢？近来谢继胜撰文对平措林寺六体六字真言碑作专题研究^⑥，其中已涉及六字真言的时代问题，可供参考。

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和研究需要，本文通过梳理六字真言的历史演变，为进一步认识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的创作年代提供依据，对该问题作一专题研究，以还历史真实面貌，并求教于方家。

一、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

据统计，敦煌石窟所见六字真言题识共 12 例，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1. 莫高窟第 464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甬道和后室组成，共存有 4 例六字真言题识，具体介绍如下：

该窟前室南壁通往东南侧室的通道口上方，有墨书梵、藏、回鹘、汉文六字真言“唵麻弥把密吽”^⑦。前室北壁通往东北侧室的通道口上方，有墨书“寂静空”“禅”以及梵文、回鹘文、藏文、汉文“唵麻尼把密吽”六字真言以及汉文“诸行无常，是生

① 张铁山、彭金章、皮特·茨默《敦煌莫高窟北区 B464 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敦煌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44-54 页。

② 杨富学《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浚县文物旅游局编《大伾文化》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184 页。

③ 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 年第 3 期，第 92 页。

④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 464 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16 页。

⑤ 杨富学《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46 页。

⑥ 谢继胜《平措林寺六体六字真言碑与蒙元真言碑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本第四分，2018 年，第 663-709 页。

⑦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62 页。

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的无常偈^①。前室西壁有回鹘文“六字真言”^②。后室东壁甬道口上方书梵文六字真言一排（图1），该梵文字体为兰札体。梵文六字之间间以花枝填充。在门南北两侧有用白灰粉刷的表面上书写有长篇回鹘文，现多已模糊^③。



图1 莫高窟第464窟后室东壁

2. 莫高窟第95窟六字真言莲花

该窟主室前部顶毁，后部有中心龕柱，中心柱东向面开一龕，龕顶绘六字真言莲花，残，现存2组（图2）；从现状分析，原应有6组。环绕中心龕柱的通道南、北、西三面的顶部，皆绘与龕顶完全相同的六字真言莲花，三面顶各5组共计15组六字真言（图3）。^④每组莲花六朵莲瓣上分别书写梵文六字真言，莲心为梵文种子字。每朵莲花周围、相互之间以立体式缠枝环绕。该梵文字体为兰札体。



图2 莫高窟第95窟龕顶六字真言莲花



图3 莫高窟第95窟中心龕柱
通道顶六字真言莲花

①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65页。

② 张铁山、彭金章、皮特·茨默《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第44页。

③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68页。

④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3. 《六字真言碣》六体文字六字真言

该碑现藏敦煌研究院，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碑上方横书正楷“莫高窟”三字，中央阴刻一四臂观音坐像。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分别刻有汉、藏、梵、回鹘、西夏、八思巴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在六字真言外围有诸多题字，主要包括功德主、写刻者等。右题“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①。

4. 莫高窟第 465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后二室组成，主室和前室均为覆斗形顶，主室设中心圆坛。在该窟前室东壁北侧墨书汉文“唵麻尼八弥吽”一行^②。

5. 莫高窟北区 B126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甬道和后室组成。前室西壁上部有朱红书写的梵文、回鹘文、藏文、汉文六字真言；北壁有朱红书写的汉文“无观世音”四字；顶部从南向北朱书汉文：“佛、法、僧”三字^③。

6. 莫高窟北区 B133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甬道和后室组成。后室西壁中部有梵文、八思巴文、藏文和汉文六字真言，似朱书，现已褪色^④。

7. 莫高窟北区 B134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甬道和后室组成。后室西壁有回鹘文、梵文朱红题记，梵文为六字真言^⑤。

8. 莫高窟北区 B217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窟顶为南北向脊的人字披顶，西披书写有朱红色的汉文和回鹘“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⑥。

9. 莫高窟北区未编号洞窟所见六字真言题识

通过实地调查，其位于第 465 窟右上角的一个小龕。该窟已全部塌毁，仅存一壁面，上墨书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六字真言，下绘一朱红色藏式佛塔，二侧分别题写“见十方佛”和“深入禅定”8 字，两侧又墨书汉文、八思巴文“唵麻弥把密吽”六字真言。右下书写有朱红色“诸行无□，是生灭□，生灭灭已，寂灭为□”的无常偈。

通过上文，敦煌石窟六字真言可分为单体梵文和多体文字合璧两种形式。单体梵文

① 参见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第 108 页。

②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第 224 页；关于莫高窟第 465 窟的六字真言题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他的敦煌石窟笔记中还记载到：“第 182 窟（即莫高窟 465 窟）有许多汉文和藏文的‘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76 页。

③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第 167 页。

④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第 213 页。

⑤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第 215 页。

⑥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307 页。

六字真言主要绘于洞窟，是壁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题识中，还书写有无常偈语，亦或是绘有简单的藏式舍利佛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二、从佛典看六字真言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

探讨六字真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对我们认识和理解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早期与“六字咒”相关经典的流传

关于“六字咒”的经典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有《佛说六字咒王经》，一卷，失译附东晋录。《佛说六字神咒王经》，一卷，失译附东晋录。《六字神咒王经》，一卷，失译附梁录。《六字大陀罗尼咒经》，一卷，失译附梁录。

从经典名称看，以上都与“六字”有关。《佛说六字咒王经》主要宣说关于观音的咒语，主要目的是能够使观世音“照我身观我身怜悯我故”。《佛说六字神咒王经》《六字神咒王经》宣说内容同《佛说六字咒王经》。《六字大陀罗尼咒经》并未提及观音，旨在宣说六字大陀罗尼咒能使众生“安隐安乐吉祥”的法力。从内容来看，这些“六字咒”经都与观音有关，就其产生的时间，应该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很流行了。所宣扬的都是观音救苦救难、除恶降魔的怜悯与慈悲，亦或是咒语的法力，没有说明“六”字与咒语（并不是六个字）、观音之间的关系，也未说明“六”的具体含义。但至少可以知道，早在东晋时，就已经有宣讲观世音慈悲的六字咒经文流传，这也是“六字”与观音产生关系的最早线索^①。

隋唐时期流行的“六字经法”，明确了“六字”与观音的关系。唐代义净译《大孔雀咒王经》是一部较为成熟的密教经典，该部经首次将咒语被神化并称之为“明王”。然而，唐密六字咒经与“六字明王”正好是观音“六趣济渡”宗教功能和咒语形象化的早期形式。^②

又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引《独醒志》所记，北宋宣和元年（1119）三月：

京师大水，鼃鼃出于院舍，宫庙危甚。诏灵素率道士治水，屡日无验……俄而，泗州大圣显于大内，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叉。上焚香拜祷，大圣振锡登城，诵密语。顷之，一白衣裹巾跪于前，若受诚谕者，万众咸睹，疑龙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诏加僧伽大圣六字师号……^③

泗州大圣是观音的化身，在这里称其为“六字师”，显然寓意其为六字观音，此六字即是六字真言无疑，也有以六字真言指代观音之意。说明到了这一时期六字观音信仰

① 李翎《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② 李翎《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第55页。

③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39，《大正藏》，第49册，第421页。

也比较流行。

(二) 宣说六字真言核心经典的产生与传播

宣说六字真言无上法力的经典，学术界的共识是来源于《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以下简称《宝王经》)，该经典旨在弘传观世音菩萨的无上法力仅仅通过诵持神奇的六字真言(经文中称“六字大明陀罗尼”) om-mani-padme-hūm 即得以实现。从时间上来看，该部经典的梵文本大约在 6-7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①。吐蕃时期，西藏地区已经开始信奉六字真言了，现存最早的文献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 年)留下的藏文写本中的六字真言残片，藏文本《宝王经》出现的时间可能最迟也超不过 9 世纪初叶^②。当时，西藏地区对六字真言的信奉就已存在，11 世纪以后，即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则广为流行^③。汉文本则是由宋代天息灾(?-1000 年)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所译，共四卷。

由此可见，9-10 世纪，随着藏、汉文本的译出，无论是藏区还是汉地，都成为信仰观世音菩萨的重要经典依据，其对六字真言的无上法力的解释与观音身形的描述达到了标准化。作为一部宣示法力的经典，其主要流传的就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也就是说，从佛典的角度来看，六字真言出现的时间应该较早，6-7 世纪已经出现，到了 983 年天息灾译出汉文本的《宝王经》，应该是六字真言大量出现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点恰好可以在辽西夏等文物中得到印证。

(三) 辽代六字真言相关经典

有宋一代，印度僧人天息灾、施护、法天等人来到中原，翻译了大量的密教经典，使得密教在中原的发展得以恢复和发展，密教经典的翻译再次兴盛起来。宋朝处在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期，与其并存的辽政权深受唐宋密教和经典仪轨的影响。辽统治者也较为重视礼遇佛僧，尤其是辽道宗笃信佛教、礼佛敬僧、广建佛塔，是辽代历史上对佛教最为虔诚的一位统治者。辽代华严宗盛行，密宗、禅宗、净土宗和律宗等也有一定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显密兼修的“显密圆通法师”道敷，他撰写的华严思想与密教思想相融合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对周边其他政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完成于寿昌三年(1097)以后到辽道宗去世之前即乾统元年(1101)之间^④。该经内容包括陀罗尼经咒二十余道，其中就包括参照《宝王经》而辑录的《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

辽宁朝阳北塔在辽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十六日重修时，信徒李加遇等将自家供养舍利等物以砖函的形式，重葬于塔的第一层大檐四面，在每个砖函内均有一块砖上有墨书舍利瘞埋题记(图 4)，其中即特别强调了“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

① [日] 今枝由郎《敦煌藏文写本六字真言简析》，第 60 页。

② [日] 今枝由郎《敦煌藏文写本六字真言简析》，第 60-61 页。

③ 李翎《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第 42 页。

④ 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67 页。

并书写梵文六字真言，又有对应的汉文六字真言“麼拏钵讷铭吽”。功德主分别是周文恕和张匡干两家人^①。此舍利瘞埋题记中分别包括了“一切如来心全身舍利宝篋经印陀罗尼经”、“法身偈”、“六字大明陀罗尼”、《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核心内容，与造塔、修塔及舍利瘞埋诸功德密切相关。题写者一再强调“舍利不是元物舍利”，功德观念浓厚。其中的梵文和汉文的六字真言是对应的，其内容来自《宝王经》。也就是说到了1044年，在辽代佛教界，梵文和汉字六字真言对应出现的情形已经较为常见了，其中梵文字体为当时常见的悉昙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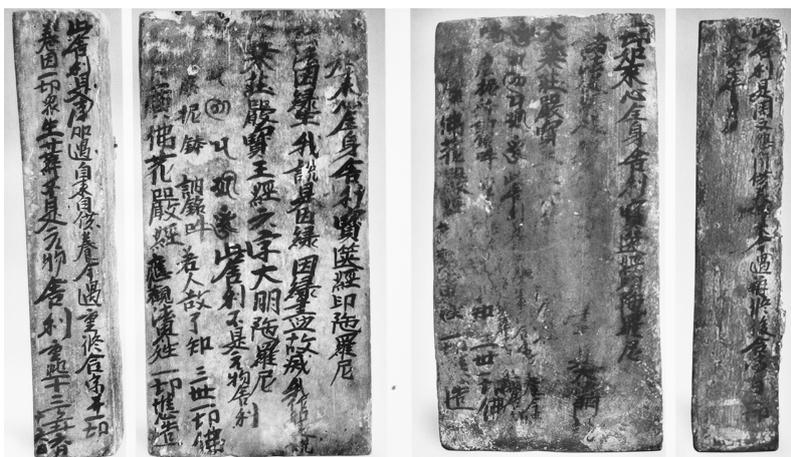


图4 朝阳北塔辽代重修砖函瘞埋舍利题记

（四）西夏六字真言相关经典

西夏统治者尤为重视佛教，各个宗派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密教在西夏发展较为深远。西夏境内流行的密教经典主要来自汉传和藏传两个方面。这些佛经除译自汉文和藏文外，还有少量梵文经典等。其中译自汉文的经典既有唐不空、义净、玄奘、伽梵达摩等和宋施护、法天、法显等人翻译的密教典籍，也有西夏僧人根据当时流行的密教经典辑录的《密咒圆因往生集》。《密咒圆因往生集》在格式上直接借鉴了《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还把《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以及唐宋时期流行的密教典籍的相应内容直接运用到了《密咒圆因往生集》中。随着辽、夏之间的交好，《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在西夏大庆七年（1200）之前就已传入西夏。随之，西夏僧人智广、慧真于大夏天庆七年（1200）参考和借鉴了《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流行的密教经典，辑录完成了《密咒圆因往生集》，由金刚幢译定完成，之后成为广为流行的密教典籍^②。其中根据《宝王经》辑录出来的“六字大明陀罗尼”就是西夏流行甚广的密咒。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0-101页，图版七五。

^② 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第277页。

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地区盗掘了大量文献、文物,包括一大批刻本佛经,其中有不少关于六字真言的内容。通过整理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刻本佛经和武威西夏墓出土文献,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六字真言。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并辑录列表梵文六字真言。

1. 俄TK136《六字大明王功德略》,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智通施,卷末有汉、梵文六字真言,对音汉字为“唵麻祢钵捺铭(二合)吽”(图5)。^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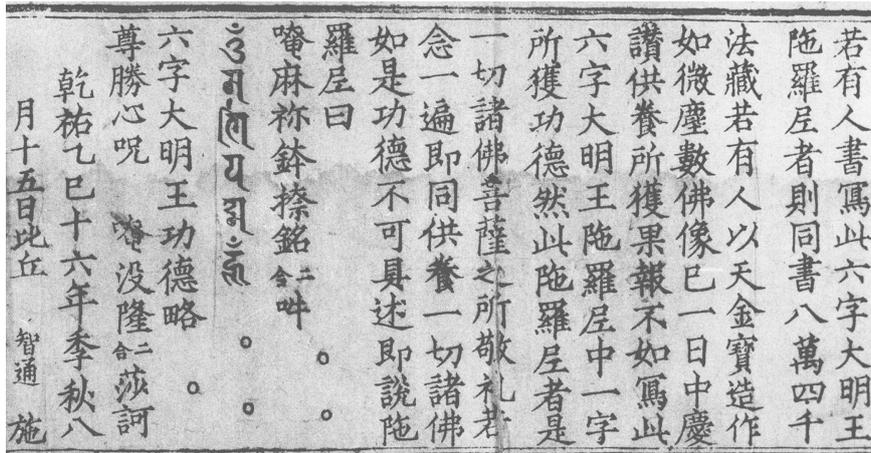


图5 俄TK136《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2. 俄TK12《佛说转女身经》,西夏天庆二年(1195)皇太后罗氏发愿所施,有六字真言,对音汉字为“唵麻祢钵嚩铭(二合)吽”。^②

3. 俄TK102《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有汉文、梵文六字真言,对音汉字为“唵麻祢钵嚩铭(二合)吽”。^③

4. 俄TK137《圣六字大明王心咒》,有汉字六字真言,对音汉字为“唵麻祢钵嚩铭(二合)吽”。^④

5. 俄TK165《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有汉文六字真言,对音汉字为“唵麻祢钵嚩铭(二合)吽”。^⑤

6. 俄TK270《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内有“六字大明真言”梵文、汉文(图6),对音汉字为“唵么拏钵讷铭(二合)吽”。^⑥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第291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第398页。

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第191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29-51页。

⑥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3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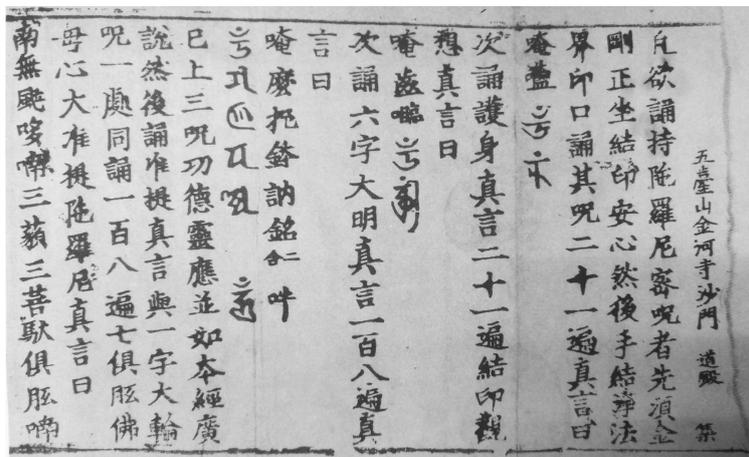


图6 俄 TK270《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从上文可知，西夏时期六字真言广为流行，较多出现在各类佛典当中，且梵汉对应，其字体为兰札体。

(五) 小结

六字咒早在东晋南朝时期已经伴随着相关经典的译出而开始出现，到了吐蕃时期随着梵文本《宝王经》的出现，在敦煌发现有藏文本的《宝王经》，说明六字真言在9世纪已经流行，而983年天息灾译出汉文本《宝王经》，应该是六字真言大量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和根本经典，在辽和西夏有较多的历史遗存，往往是梵汉对应出现，其中辽塔中的梵文字体为悉昙体，而西夏刻本佛经中的梵文字体则为兰札体。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西夏木缘塔周身皆书兰札体梵字经咒。霍巍先生认为，兰札体流行的时间更早，梵文悉昙体“到晚唐逐渐被梵文蓝查体和天城体所代替”。^①在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佛画中就有兰札体梵文经咒。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唐卡中也有书写兰札体梵文的现象。这足以说明至少在西夏时期，兰札体梵文就已经盛行了。然而，林光明先生则认为“若就中国流传梵字的时间顺序来看……兰札体则是始于元而盛于明清”，而“汉地的兰札体梵字在元代虽未盛行，但亦保留很多兰札体经幢、石碑等书迹”^②。由此，后世大多学者将元代定为兰札体在中国流行的最早年代^③。就上述研究而言，兰札体梵字最早出现在元朝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三、宋辽金夏时期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我们发现受佛教的影响，信仰佛教的宋辽金西夏人往往把对六字真言的信仰也带入

① 霍巍《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考古》2001年第5期，第85页。

② 林光明编著《兰札体梵字入门》，台北：台北嘉丰出版社，2004年，第11、16页。

③ 张宝胜《敦煌梵字陀罗尼》，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458页；杨富学《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第55页。

墓葬中来。

（一）辽代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在辽代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六字真言，其中最为典型的出自宣化辽代壁画墓群^①。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墓群进行了四次发掘，共发掘古墓十五座，其中有九座墓是张氏和韩氏的家族墓，时间都处在辽代晚期。在该墓群中除了精美而丰富的壁画内容外，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葬具陀罗尼木棺。这些陀罗尼木棺虽各有不同程度的毁损，但根据仅存的陀罗尼经咒依然能够辨识出其中所写的内容。六字真言就是这些陀罗尼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咒语，主要题写在棺身左壁或者右壁，并且皆有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现根据墓主卒年时间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

1. 宣化 M10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墓主张匡正，卒于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道宗大安九年（1093）改葬于此。出土陀罗尼经咒木棺一具，木棺之顶部和四壁均书有墨书经咒文，有汉文和梵文（图 7）。棺身左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共 11 行，其中汉文题名有“佛说生天陀罗尼”“佛说转生净土陀罗尼”“五字大明陀罗尼”“六字大明陀罗尼”“满愿陀罗尼”“授菩提心戒真言”“地质”等。

2. 宣化 M7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墓主张文藻，卒于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道宗大安九年（1093）改葬于此。出土陀罗尼经咒木棺一具，木棺顶部和四壁均书有墨书经咒文，有汉文和梵文。其中木棺右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图 8），共存 11 行，汉文题名分别是“佛说生天陀罗尼”“佛说转生净土陀罗尼”“五字大明陀罗尼”“六字大明陀罗尼”“满愿陀罗尼”“授菩提心戒真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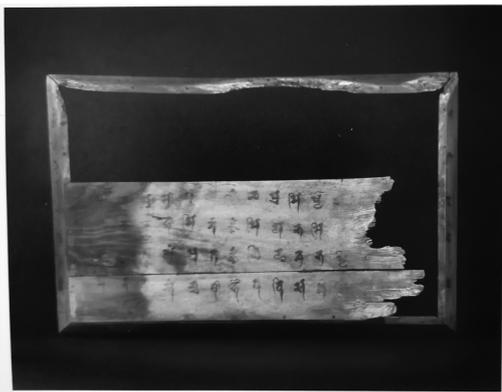


图 7 宣化 10 号墓木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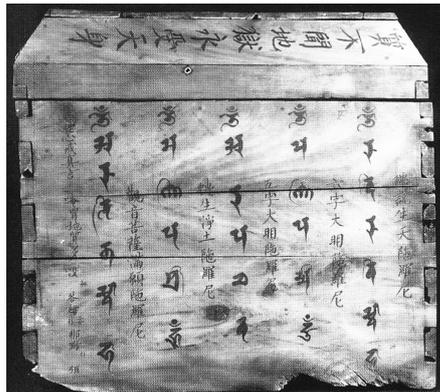


图 8 辽代宣化 M7 木棺右壁
墨书梵、汉文经咒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第 29、86、136、199 页。

3. 宣化 M3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属于夫妻合葬墓，其墓主张世本，卒于辽道宗大安四年（1088），道宗大安九年（1093）改葬于此，其妻焦氏孀居多年后卒于金皇统三年（1143），皇统四年（1144）改葬于此。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木棺保存较完整。木棺右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 11 行，汉文题名分别是“佛上生天陀罗尼”“六字大明陀罗尼”“五字大明陀罗尼”“转生净土陀罗尼”“观音菩萨满愿陀罗尼”“授菩提心戒真言……”等。

4. 宣化 M1 木棺的六字真言

该墓中木棺已腐朽，仅存棺板 7 块，5 块在棺壁上墨书梵文陀罗尼经咒，其中一块棺板包括三个智炬咒和六字大明咒，其余各块经文内容大同小异。

由上可知，在辽代晚期，六字真言已被广泛地运用于世俗墓葬。从名称上看，汉文都写作“六字大明陀罗尼”，这与《宝王经》中记载的名称相一致。从佛教功能上看，运用在墓葬中，正与《宝王经》中宣说的超度亡灵免受六道轮回之苦的夙愿相吻合。从字体形式上看，这些陀罗尼皆由悉昙体（Siddham）书写而成^①。

（二）西夏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甘肃武威西郊附近先后发现了 7 座西夏墓葬，出土了木缘塔、木棺、木版画等一批重要文物，有一定数量的陀罗尼经咒，就包括梵文、汉文六字真言。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1.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 1 号墓出土木缘塔 1 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缘塔为松木质，高 43 厘米，底径 29 厘米。塔座缺，塔身由六角形木版组成，表面用蓝色打底，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用卯榫和木楔固定。塔顶残缺不全，六角形顶盖，木板上有墨书题记：“彭城刘庆寿母李氏顺桥，殖大夏天庆元年（1194）正月卅日身歿，夫刘仲达讫”。最后还有一行梵文六字真言^②。塔顶分两层，上面画红、白色云纹图案；顶呈朵形，用白底蓝边黑线勾画线条。塔身底色及咒语剥落严重，顶残缺不全，塔身为两截，底缺。

2.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 1 号墓出土木缘塔 2 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缘塔为松木质，仅存塔身木版六块、塔座和一块墨书汉文塔盖。塔身表面用蓝色打底，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木缘塔内制六边形盖子上墨书汉文：“故亡考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两处都案刘仲达灵匣，时大夏天庆八年（1202）岁次辛酉仲春二十三日百五侵晨葬讫，长男刘元秀请记”。最后还有一行梵文六字真言^③。

3. 武威西郊十字路口西夏墓梯形小木棺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棺左帮墨绘五男仕，立姿，面均向左。内侧刻画西夏文六字，前两字不清，后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352-360 页。

^② 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第 67 页。

^③ 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著《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310 页。

四字汉译为“九年四月”。右帮残存墨绘两仕女半身像，面朝左。前案头呈梯形，正面书写汉字真言“唵没隆唵嘛弥”。^①其中后三字为六字真言的一部分。

4. 武威城区乡镇企业局家属楼西夏墓六字真言经咒

该墓出土有多件随葬品，其中1件墨书木牌位，上有墨书题记，从左至右分别是：“长男唐吉祥，次男□□”“亡过弟子唐奴见”“天庆辛酉八年（1202）正月□□”；5件墨书佛教经咒，分别用汉文正楷书写“□麻你钵名□”“□□□没莎河”和“□□□药师留梨光佛”“□□□本师释迦牟尼佛”等，立于墓室周围。^②

武威西夏墓出土六字真言文献包括梵文和汉文两种，大多有明确的纪年题记，时间处于西夏中晚期，与前文西夏刻本佛经中六字真言产生的时间相一致。

（三）宋金墓葬中的梵字真言

在宋金时期墓葬壁画中，出现了一些文字难以辨识的书屏，如有河南禹县白沙1号宋墓前室西壁的墓主夫妇“开芳宴”壁画屏风上的文字（图9）^③，白沙2号宋墓墓室西南壁的墓主夫妇“开芳宴”画面中书屏墨书文字^④，河南登封箭沟宋墓东壁壁画上的文字^⑤，登封黑山沟宋墓西南壁壁画屏风上的文字^⑥，考古报告均称其字迹潦草不可辨识，多以“行草”书法称之。但据李清泉的研究，认为这类现象的频频出现，推测这些绝大多数通篇无法辨读的书屏文字符号，模仿的应该是一种当时一般人熟而不识但形似草书的佛教专用文字——悉



图9 白沙宋墓1号墓主人

昙体梵文，这些看似草书的难以辨识的书屏文字，更多的可能是些似是而非的“梵字”——不识梵字的画工用以表示屏内文字是一段不可以言传意会的梵文经咒^⑦。并认为其出现的原因和功用“无外乎因为时人相信，这类梵文经咒，其神秘的形式本身就具有一种秘密而强大的法力，尤其具有破地狱和救助死者转生净土的特殊功效。”^⑧梵

① 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著《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第312页。

② 常岚、于光建《武威西郊西夏墓葬题记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08页；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著《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第317页。

③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④ 宿白《白沙宋墓》，第74页。

⑤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158页。

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文物》2001年第10期，第61页。

⑦ 李清泉《佛教改变了什么——来自五代宋辽金墓葬美术的观察》，载巫鸿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4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255-257页。

⑧ 李清泉《佛教改变了什么——来自五代宋辽金墓葬美术的观察》，第256页。

文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中，其使用功能可得到1991年发现的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墓室北壁、西北壁、东北壁以及东、西两壁等处墨书长短不一的梵文经咒的佐证，在该墓顶北侧还遗有汉字题记一行：“真言梵字触尸骨，亡者即生净土中；见佛闻法亲授记，速证无上大菩提！”^①李清泉观察指出，此题记的书写，表明“当时对佛教经教的崇拜，已发展到迷信梵语文字本身的程度。”^②

若按李清泉的研究，结合宣化辽墓、武威西夏墓葬中频繁出现的梵文六字真言题识，考虑到六字真言的破地狱与度亡功能，以上这些墓葬壁画中的梵字文字，设计者和绘画书写者最初即书有梵字六字真言的可能性极大。

（四）小结

佛教六字真言信仰在宋辽金西夏时期已经深入到时人的生死墓葬中，旨在通过在墓葬中书写梵文六字真言，表现“真言梵字触尸骨，亡者即生净土中；见佛闻法亲授记，速证无上大菩提”的基本信仰。其梵文有悉昙体，有兰札体，也有梵汉对照的形式。从墓葬出土可证，这一时期六字真言信仰已较为普遍。通过这些重要墓葬六字真言文字资料可知，独立的六字真言信仰与崇拜在宋辽金夏时期颇为流行。因此，杨富学认为“六字真言信仰固然出现较早，但从经典中被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崇拜对象，乃至在中原及周边地区流行，那已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之事了，更勿论兰札体兴起于元代这一标志性因素。”^③显然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没有说服力。

四、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年代辨析

敦煌石窟今存有较多的六字真言题识，形式不一，内容丰富，最早产生于什么时代？是现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前文的梳理可知，六字真言信仰出现的时间颇早，而梵文六字真言在辽、西夏时期已经颇为流行，广泛出现在墓葬和写经刻经中。由上可知，梵汉对照的六字真言在辽和西夏佛教界已较多见到，单体梵文六字真言在辽墓和西夏墓葬中也有出现，而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则在元代相当流行。

有了以上宋辽金西夏时期丰富的六字真言实物资料，对我们推断敦煌石窟六字真言的题写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至少，现在看来认为六字真言最早出现在元代之说实难成立，严重不合历史事实。

（一）莫高窟第464窟后室东壁六字真言题识

第464窟后室壁画的创作年代，一直是敦煌石窟分期断代的热点话题，主要有两种

① 邵国田等《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第92页。

② 李清泉《佛教改变了什么——来自五代宋辽金墓葬美术的观察》，第257页。

③ 杨富学《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第55页。

不同的观点。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张大千通过考察，提出该窟为“西夏、回鹘修”^①。敦煌研究院整理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认为该窟是“西夏窟（元重修）”^②。梁尉英指出该窟为“西夏洞窟”^③。谢继胜通过后室壁画艺术风格的考察，进一步将其确定为“西夏窟”^④。除了上述学者提出的西夏说以外，新近杨富学提出元代说^⑤。

因此，目前学界对于第 464 窟后室壁画的创作时代有西夏说和元代说两种。就西夏说而言，谢继胜认为，莫高窟第 464 窟后室窟顶藻井中央大日如来像的藏传绘画风格是西夏时期常见的艺术风格，画面整体风格与宁夏贺兰山山嘴沟西夏壁画较为接近。

杨富学除了反驳谢继胜上述看法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能够直接否定西夏说的观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读作：om mani padme hūm（唵嘛呢把密吽，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与壁画浑然一体，属于同一时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⑥因此，将第 464 窟后室断定为元代早期洞窟。

但据我们的研究知，六字真言在西夏统治敦煌地区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流行了。从书写形式上看，该窟后室东壁门上方六字真言与西夏刻本佛经的书写方式一致，同为兰札体，不同于其他较晚的敦煌石窟多体六字真言。因此，第 464 窟后室东壁门上方的六字真言与西夏刻本佛经、西夏墓葬中的六字真言属于同一时期，即西夏中晚期。

除此之外，第 464 窟后室壁画内容中还有较多的西夏元素，如南壁上师像，与榆林窟第 29 窟的上师像较相似，但不同于其他观音化现的场景。该铺图像绘有四个人物，中间是绘一上师，戴莲花帽，右袒袈裟，跏趺坐，无头光。身后立三人，其一为身着袈裟的僧人，另有男、女侍从各一位。男侍与僧人立于右侧，交谈状，男侍手持伞盖。女侍立于左侧，手持一团扇，面向上师。

在这一图像中，除了上师像是西夏时期流行的形象以外，还有其他西夏流行的形象。从发式上看，男、女侍的发式是典型的西夏辫发。根据现有的史料，西夏辫发男女皆适用。有繁简和对称、非对称之别。一般是面额两鬓有梳者，脑后中间或左右均有留者^⑦。该男、女侍从后面是否有辫发并不明显，但从前面看，面额、两鬓有梳下的头发，呈不对称状。这一发式我们还可以在黑水城出土帛画中看到^⑧，属于西夏典型的男女侍从发式。从服饰上看，男侍身着长袍，系腰带，齐领，宽袖，下着长裤，赤脚；女侍亦着长袍，齐领，窄袖，右肩有一装饰物。

① 张大千《莫高窟记》，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第628-629页。

②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189页。

③ 梁尉英《元代早期显密融汇的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诸窟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六四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④ 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69-79页。

⑤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第16页。

⑥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第5页。

⑦ 吴峰天《西夏发式初探》，《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

⑧ 吴峰天《西夏发式初探》，第276页。

在西夏男子服饰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配饰，即腰带。西夏文本《碎金》记载，“头戴云冠美，身服腰带缠”^①，这足以说明腰带在西夏服饰中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同样，我们在榆林窟第29窟中的男供养人像、武威西夏墓出土木版画中的男仕都有相类似的腰带。西夏服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窄袖，与其本身的游牧民族特色息息相关。该女侍即为窄袖，其右肩上装饰物与武威西夏墓出土的木版画中相似，不过是在男仕左肩上。

最近敦煌研究院与英国牛津大学联合进行莫高窟部分洞窟的C14年代测定，其中在第465窟前后室多处采样测年数据显示其为西夏时期^②。第465窟与第464窟关系密切，按谢继胜观点，二者是同一时期的洞窟，因此此科学测年数据同样对我们推断第464窟为西夏时期洞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莫高窟第464窟后室东壁门上方的梵文六字真言与洞窟内壁画浑然一体，南壁上师画像有很强烈的西夏色彩，加之谢继胜对该窟后室其他壁画风格的分析，足以说明该窟后室壁画创作于西夏时期。其中东壁门上的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属于西夏时期作品，也可以得到有明确纪年的武威西夏墓葬木缘塔（天庆元年，1194年；天庆八年，1202年）、黑水城西夏刻本佛经（乾祐十六年，1185年）中出现的同类六字真言的佐证。

（二）莫高窟第95窟六字真言莲花

第95窟（图10）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元代窟^③，但最近有学者指出该窟为西夏窟，并认为该窟“中心龕柱内顶部的六字真言莲花为西夏绘画，通道顶部团花图案是元代重绘。”^④然而，六字真言及观音种子字本就在西夏时期相当流行，该窟六字真言莲花图案中央的种子字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经文献中较为常见，如在俄TK271《密咒圆因往生集》中有“阿弥陀佛一字咒”即“”^⑤，该经被认为是西夏天庆七年（1200）的作品^⑥；另，俄TK164十一面观音版画主尊下即有一种子字“”^⑦；俄TK164《御制后序发愿文》背面有持经者所手写的种子字“”^⑧。据沈卫荣研究，TK164《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可能直接译自梵文原典^⑨。此发愿文是仁宗

①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15页。

② 2019年7月23日上午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笔者有幸聆听了牛津大学一行的敦煌石窟测年报告，具体成果未发表。感谢牛津大学刘睿良博士提供相关信息。

③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37页。

④ 王胜泽《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49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359页。

⑥ 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9页。

⑦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30页。

⑧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41页。

⑨ 沈卫荣《汉藏文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比较研究》，沈卫荣著《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0-346页。

仁孝所制，时间在天盛元年，有西夏文本，也有汉文本^①。在宁夏灵武横山乡石坝村的发现的一件西夏银合上也有这样的种子字^②。所以杨富学把东千佛洞第2窟出现的二处梵文种字归为元代标志性因素^③，现在看来均无法成立。西夏版画中的佛菩萨像下常有相应的种子字出现，以TK164《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四幅版画为代表^④，属于仁宗仁孝时期作品，每幅画面的主尊下面均有兰札体梵文种子字。



图10 莫高窟第95窟中心龕柱

元代大力推崇藏传佛教，也有六字真言与种子字同时出现的情况，如在河南浚县大伾山天宁寺大佛楼北石壁，有至元六年（1340）横题朱书梵文六字真言，上方有一观音菩萨种子字^⑤；浮丘山千佛寺石刻上方石壁亦有梵文六字真言题刻，上方也有同样的种子字^⑥。可见此类种子字在西夏元均有流行。

从佛教意义上看，第95窟六字真言团花中央的种子字既可以看作是现世的观世音菩萨，也可以看作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第95窟主室中心龕柱东向面内塑六臂观音，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左右第一手结印，左右二、三手中似持物，现已不存，无法辨认，后有头光和身光。

关于六臂观音，《大正藏》图像册《图像六·白宝口抄》卷49有所记载，其中“六字经法·名字事”中记载了“六字经法”与观音的关系：

口云：六字者……六观音名字也，是以六观音为本尊故也。

六字经验记：六字者，观自在菩萨异名，所谓六字者，一大慈观自在菩萨，二

① 段玉泉《西夏文〈自在大悲心、胜相顶尊后序发愿文〉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81-85页。录文另见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第23-31页。

② 杨富学《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第54-55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彩版三，第29、30页。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1-353页。

④ 杨富学《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第174页。

大悲观自在菩萨，三师子无畏观自在菩萨，四师子丈夫观自在菩萨，五大光布施观自在菩萨，六大梵观自在菩萨。六观音种子之六字变成六观音。

由此可见，第95窟中心龛柱六臂观音造像也许正是观音“六趣济度”的宗教功能的集中体现。这也与最先流行的“六字咒”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六字观音是六个观音，“六字咒”是这六个观音的种子字，并且也可以变现成一个六臂的独立造型，被称之为“六字明王”或“六字天”。无论如何，六臂观音造型经过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并且其与六字真言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恰好符合该窟佛教造像与六字真言莲花之间的组合关系，同时也与龛二侧的水月观音相搭配，整窟观音主体信仰与思想是明确的。

所以整体上而言第95窟强烈的观音信仰，龛内主尊六臂观音与龛两侧的水月观音，加上龛顶与通道顶上的六字真言与观音种子字，可以认为这是一处观音的道场，对称的水月观音也正是西夏的榆林窟第2窟、东千佛洞第2窟、东千佛洞第5窟的布局方式，结合常红红对东千佛洞第2窟和第5窟的研究^①，西夏时期双水月观音在洞窟中的出现，和洞窟度亡功能密切相关，而这正是六字真言的核心大用，与辽墓、西夏墓葬中书写六字真言的意图完全一致。

因此，总体观察，第95窟六字真言莲花的时代应为西夏时期。

这一断代也可得到有关该窟地仗层研究的佐证，于宗仁在研究敦煌元代洞窟壁画地仗层材料与工艺时，按之前的传统观点，把第95窟也列入元代洞窟采样，结果发现“第95窟地仗细泥层工艺一种细腻，一种粗糙，存在很大差别，同时，两种形式的地仗材料在莫高窟都是非常少见的但同时出现在莫高窟第95窟中，这说明窟壁画的材料和工艺是非常特殊的。”^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区别，显然是时代判断出了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如前王胜泽的研究，第95窟中心柱通道两壁所画罗汉像的时代应该晚到元或更晚，但顶上的六字真言莲花应该和龛顶相一致，均为西夏时期。

同样据敦煌研究院和牛津大学合作的C14测年，第95窟第一期的时间即是西夏时期段^③，与我们的研究不谋而合。

（三）敦煌石窟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

敦煌石窟多种文字六字真言的题识与元代藏传佛教的兴盛和多民族群体共同生活有直接的联系。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的盛行，信仰六字真言的方式与汉地有所不同，更加趋于简单，即正如和藏地流行的方式一样，随处可见的六字真言题记在各地开始流行。为了团结境内各个民族，使多族人士更加能够迅速的接受藏传佛教，多体文字六字真言题识就由此产生了。除了敦煌石窟，在河南浚县大伾山、杭州飞来峰等地也留存有

^① 常红红《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 于宗仁《敦煌石窟元代壁画材料及制作工艺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1页。

^③ 感谢牛津大学刘睿良博士提供相关研究信息。

多例的多种文字题写的六字真言。在书写形式上，莫高窟北区石窟与河南浚县大伾山梵文六字真言属于同一种字体，应属于同一时期，即元代晚期。

（四）小结

综上所述，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最早产生于西夏时期，主要以莫高窟第 464 窟后室东壁门上六字真言题识和第 95 窟六字真言莲花为主。有元一代，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多种文字六字真言广泛流传，作为佛教圣地莫高窟，以莫高窟北区诸多石窟为例，皆为元代之遗墨。

结 语

六字真言的信仰自 9 至 10 世纪藏、汉译本《宝王经》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了。六字真言首先在藏族中间流传，是藏区最受尊崇的咒语，其神奇的法力早就被当地人们认可。随着宋代印度僧人天息灾来华，译出汉文本《宝王经》，六字真言信仰与观世音菩萨救渡六道轮回的思想在汉地逐渐受到信众的接受。尤其是作为崇尚佛教的辽和西夏民族政权多次向宋请求大藏经，而《宝王经》作为一部宣扬观世音菩萨法力与神奇的六字真言的密教经典更是深受欢迎。因此，六字真言作为密教咒语逐渐在辽、西夏境内广为流传，尤其是在宋辽金夏墓葬中的流行，让人耳目一新。有元一代，藏传佛教深受元代统治者的尊崇，在藏族中最受尊崇的六字真言自然继续广泛流传，逐渐建立起深厚的信仰基础。

敦煌石窟现存有较多六字真言题识，最早产生于西夏时期，以莫高窟第 464、95 窟为代表，是梵文兰札体字，到了元代多体字合璧六字真言流行。将六字真言绘于洞窟中，与其宗教功能息息相关，六字真言作为观世音菩萨咒语，诵持可得离苦，往生极乐，面见无量佛，皆为现世人们摆脱苦难生活的一生夙愿，正是西夏时期观音和净土往生信仰流行的表现。因此，明确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产生的时代，对我们认识西夏佛教、研究敦煌西夏石窟断代和洞窟营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有重要的学术意义。